

归有光与项脊精神

◆ 朱明歧

归有光是明代文学家。他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被誉为“明文第一”。其代表作《项脊轩志》，被编入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课本。然而支撑他在中国散文创作史上这座丰碑的基石，是他独具的“项脊精神”。项脊轩是归有光的书斋名。

一

归氏为什么取“项脊”作为小书房的斋号呢？而且自号“项脊生”。据记载，归有光的远祖归隆道曾居住在江苏太仓项脊泾，所以取“项脊”之名含有追宗怀远之意。这当然是取“项脊”的原因之一，应该说追怀先祖的内容是丰富而广泛的，而归氏独钟情于“项脊”两字，其中一定另有深意。从本义上，项脊的“项”是指头的后部，泛称颈项，“脊”为背中间的骨头即脊柱。颈项支撑人体的头颅，脊柱支撑人的躯体。项脊，泛称脊梁，是人体全身骨骼的主干，也是支撑人体的栋梁。项脊泾应是一条状如项脊的小河，取名“项脊”本身也可能蕴含了小河状如人体“项脊”之特征。“项”字另一引申义当是“强项”，也就是今所谓“犟头倔脑”，其本有“刚正”、不肯轻易低头（因为头颈硬）之意，《后汉书·杨震传》载：“卿强项，真杨震子孙！”《史通·直书》：“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都是说的“强项”刚直之意。最著名的典故，是后汉初“强项令”董宣（典出《后汉书·酷吏传》）。

作为明代文人，以上这些想必为归氏所熟稔与激赏。南宋咸淳六年刊刻的《朱子语类大全》卷五二载“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句中使用了“脊梁”两字。自此以后，“脊梁”打上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印记，常比喻文人志士的意志、胆量和节操。归有光是一个通过科举取士的儒生，对“脊梁”两字自然铭记于心。他在19岁时所撰的另一篇《书斋铭》文中，反复以“项脊生”自称，抒发要学习效法颜回、朱熹的节操和高远志向。“曷敢怀居，学颜之志”，“余闻朱文公欲于罗浮山静坐十年。盖昔之名人高士，其学多得之长山大谷之中：人迹之所不至，以其气清神凝而不乱也”。因此，他用“项脊”取名的情怀也就不难理解了。显然，意志、胆量和节操就是归有光“项脊精神”的具体内核，也是归有光选用“项脊”作斋号和名号的深层动因。

二

项脊轩是归有光“项脊精神”的发祥地。项脊轩原来是归家的一幢百年老屋，位于昆山宣化坊。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就是通过对这间老屋的变化和几件小事的描述表达了对家人的深情。生活细节的实情、

质朴语言的真情、文章叠词的助情使得《项脊轩志》成为千古名文。然而，情的背后是义，情到深处泪自流，有情才有义，有深情就会有大义，有义就有担当，有义才有气节。这种气节就是项脊精神，所呈现的意志就是项脊精神。本文中“项脊生曰”一段没有使用其他人称代词，如“余”“予”等，而是直接用“项脊生”，以此想表达作者要像诸葛亮一样做一番大事的意志和胆量。当然这里也有模仿“太史公曰”的笔法。《史记》诚为良史，归氏仿之，以史笔写陋室、短文，其志固不在一室一时也。以自己的“区区处败屋中”，比喻古代蜀清和诸葛亮两名人未出世时的“昧昧于一隅”，来表达自己怀抱着宏图大志，全不以陋室为陋的风骨节操。显然诸葛亮已经成为他心中仰慕的“英雄”。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许多事情也证明了归有光对项脊

写抗倭计策的文章更是闪耀着“项脊精神”的光芒。

项脊精神不仅是嘉定文派的思想源头，也是“嘉定三屠”的文化基石。“嘉定三屠”中的抗清首领黄淳耀深受归有光思想的影响。黄淳耀的老师归子顾是归有光的侄子，归子顾的父亲叫归有升，与归有光是同辈同族。归子顾继承家学，忠孝廉节。归有光的曾孙归庄赞誉归子顾：“昔有太仆，一代文宗。自他有耀，在司寇公”。司寇公就是归子顾，这说明归子顾对归有光思想的一脉传承。黄淳耀在归子顾去世后为其师所作传中说：“公于书无所不窥，为文章师法震川。”这也表明归子顾对归有光学术思想薪火相传。

黄淳耀从15岁起师从归子顾，听讲归有光故事，阅读归有光文章，以归有光为心中的英雄。年长后又与归庄切磋交流学问，他们亦师亦友，归庄

基础。黄淳耀在归子顾和嘉定四先生的引导和影响下不仅继承了归有光的项脊精神，而且发展出了忠烈文化。明末清初，国家分崩离析，黄淳耀写下了《黄烈妇传》一文，文中一方面提倡殉节背后的忠烈思想，另一方面歌颂黄烈妇殉节的坚定意志。一个女子视死如归，以死明志，那么在国难当头时，士大夫应该如何做呢？黄淳耀如是说：“悲夫，国家养士三百年，而一旦贼陷京师，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从而臣仆焉者，麻立于燕齐之疆，奉表劝进者比比也。彼平日之所读者，何书哉？”国家沦陷，士大夫平时宣扬的忠孝廉节丧失殆尽，读的什么书呀？不难窥见，黄淳耀在文中已透出“志烈焯焯，与日月争光”的为国捐躯、杀身成仁的“项脊精神”。此外，归有光在抗倭中表现出的意志、胆量、节操都让黄淳耀浸润其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黄淳耀在抗清中的义举也说明归有光对他的深刻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嘉定三屠”的另一位抗清首领侯峒曾也与归庄是好朋友，侯峒曾也是归有光项脊精神的传承人，忠烈文化的践行者。这样说来，如果没有归有光，“嘉定三屠”会不会发生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之，没有归有光的“项脊精神”就难以在嘉定形成忠烈文化的民众基础，更难以诞生黄淳耀这样的抗清英雄。当“嘉定三屠”产生的文化土壤不复存在了，“嘉定三屠”的规模、次数、悲壮程度至少将有很大的变数，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

归有光的“项脊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之一。如果把明代中期以后的嘉定文化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归有光文学成就背后的思想精神就是支撑这个躯体的项颈与脊椎（即项脊）。抽掉归有光的“项脊精神”，明代嘉定文化将失去支撑点，嘉定文派也将失去特征，抑或轰然倒塌也是不为过的。归有光自号项脊生，通俗点说，就是标示自己是个有脊梁骨的人。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一个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没有“项脊精神”的人其人格是有缺陷的，没有“项脊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项脊精神”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国家。弘扬“项脊精神”就是要倡导做人要有脊梁骨，要有守住底线的操守，要有面对困境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意志，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敢于自我牺牲的胆量。因此，践行“项脊精神”在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在新时代要有新责任，新担当。



▲ 归有光塑像

精神的践行。“八上公车而不遇”，落榜八次直到六十岁时才成进士，以及人生三大不幸“幼年丧亲，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都没有压垮他，就是很好的明证。

三

归有光关怀现实，经世致用。他移居安亭世美堂后不久，安亭发生了一件惨案即张贞女案。受冤人是一名普通女子，为此归有光呼号伸冤，先后连写了十一篇文章，表现出了伸张正义的士大夫意志。归有光通过张贞女作为激发男子正气，弘扬儒家传统道德的代表，开启后世嘉定文人屡屡颂扬贞节烈妇，倡导“项脊精神”的先河。作为一个客居他乡的落榜生，他不畏强权、为民鸣冤的胆量为当时及后来的嘉定文人所推崇备至。不仅如此，归有光抗倭的坚定意志、亲历抗倭不怕牺牲的胆量、文以致用撰

爱读六朝的小品文，也爱读晚明的尺牍。

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所谓“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一句，即含书信之义。汉以后，人们以尺牍互通音讯，遂成书信的别称，而与之相近的名称，则有素书、尺素、书尺、尺翰、简札、简帖、书札等。尺牍二字，通常和“小品文”挂钩，实指书信中风格峭拔、灵性充盈的一类文字，其篇幅之精简、文采之斐然，成为古代文人神思奔会、抒发性情的一种独特样式，堪称“絮语类美文”的典范。若按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乃“舒布其言，陈之简牍……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其实，尺牍与小品文形式类同，却完全等同，那些粗鄙无文、拙于辞翰，或借用韩愈所说“文辞少葳蕤”的往来文字，只属一般尺牍，却不能与富含文学的小品文相颉颃。

尺牍文体的溯源，可以上至上古、秦汉时期，但大都体现为史传文字的应用，并无独立的范式。经过载籍传递，悠悠承续，遂使滥觞于魏晋。那时的简、帖，不仅文辞优美，写法灵动，而且辅以高超的书法（以王羲之父子尺牍真迹及唐摹本为代表），是古人风雅兴寄、无意于佳乃佳的一种萧散、神逸之品。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和干宝的《搜神记》，虽可列“轶事小说”的欣赏范畴，却都采取了小品文的言说方式，其清淡放旷、简约峻远的神韵，自成响达高广的风致，余波所及，使得晚明的小品文亦深受影响。这期间，不可忽略的是，尺牍小品直到宋朝，才抵临扶疏萎郁、名手如云的佳境，当然，这和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学殖深厚、笔墨垂范、引领风尚的超拔才力密切相关，且有多种尺牍专集问世，比如《范文正公尺牍》《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山谷老人刀笔》《欧苏手简》《东坡志林》《苏黄尺牍》等。其实，一代名臣和大文豪的尺牍小品虽埋藏岁久，但之所以备受后人重视，并不仅仅出于文辞的欣赏，更有遐想风器、景慕先贤的精神需求。

目下学界公认的是，尺牍一类文字，到了晚明清初，才达到飙兴出奇、攀古流芳、蔚为大成的地步。虽然明清的尺牍大家，在文学史上并没有“欧苏”那般崇高的地位，但在尺牍小品的创作上，植品甚高，收录他们作品的集子大多得以流布后世。比如清福建左布政使周亮工的《尺牍新钞》，辑录明末清初230多人近千篇尺牍，将“文人赠答之篇，一时挥洒之制”的尺牍与“经国大业”的文章对举，强调尺牍“篇无定格，幅不同规，标举兴会”的特质。其他尺牍小品的名作大致有：万历年间吕坤的《呻吟语》，是了解明末世态及士人心态的可供借鉴之作；笠翁李渔的《闲情偶寄》，寓庄论于闲情，以雅淡之品、妙思之智、缔造之周，被林语堂喻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陶庵张岱，一生以小品散文名世，他的《夜航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及《琅嬛文集》，以幽深孤峭、真率自然、博雅疏宕的笔触，“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成就”（郑振铎语）。而“前后七子”、竟陵派大家谭友夏、钟惺以及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在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上虽存迥异，但在小品文的创作和理论建设上皆成就不凡。个人以为，袁宏道的《袁中郎尺牍》和谭友夏的《鵩湾文草》，堪为此间翘楚。值得一提的还有清初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龚鼎的《雪鸿轩尺牍》、许思湄《秋水轩尺牍》，被誉为清代三大尺牍，尤其袁枚尺牍之骈散相间、典雅华美，深得六朝风致。至于杨慎、张居正、王世贞、汤显祖、孔尚任、陈继儒、钱谦益、李贽、归有光、徐渭、金圣叹及各路山人寸楮尺缣的小品文字，不仅佳构叠出，而且风格多样，各具面目。

于今而言，尺牍文学式微久矣。作为一种文学类别，或许还不能把它定位古典文学的主流样式，但其文墨之芬芳、清辉之流映、形态之简约和风格之峭拔，堪称性灵文学的直观呈现；且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门类，留给中国古典文学史的，是一道虽渐行渐远、却声传不绝的飞鸿之影。

尺牍之品

喻军